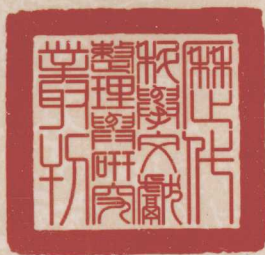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



陈水云 陈晓红 校注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

陈水云 陈晓红 校注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陈水云,陈晓红校注.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9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06947-3

I. 梁… II. ①陈… ②陈… III. 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341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8.5 字数:1059千字 插页:4

版次: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6947-3/D·880 定价:32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傅璇琮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海峰 刘爱松 陈文新 陈水云

张思齐 罗积勇 周 群 赵伯陶

陶佳珞 黄 强 詹杭伦 霍有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36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①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她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提示我们，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置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鲁小姐这份功课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

^① 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4期。

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年）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思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数。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③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4～115页。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的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①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珪、周鏊、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②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年）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

① 赵翼：《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廿二史札记》卷30。

② 赵翼著、王树机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兵起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① 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年）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② 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

^①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②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① 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才能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得以继续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它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唐代杜佑《通典》中特设“选举”类。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代登科记多已散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代以后的登科记保存较多，明清有关材料更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士奇《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篇，清文1集，选文290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出版预计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前4年（2006—2009年）用来整理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后4年（2010—2013年）内陆续推出10本以上的研究性著作。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批书目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曾有断代或内容单一的科举文献陆续问世，如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未经整理），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一大套精装本《清代朱卷集成》（未经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由杨学为主编的7册10卷近千万字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未经整理），龚延明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也在编纂之中。所有这些都极有价值，但它们所涉及的只是某一类别，或限于登科录，或限于朱卷，或限于考试，尚不具备综合性的品格。我们这套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

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08年12月28日

于武汉大学

前言

八股文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应用的一种主要文体，对明清两代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个人心态及文学创作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长期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学术界对八股文多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对八股文的看法大多停留在鄙视的范围，而很少对这一文体的生成背景、发展脉络、文化价值作过忠实而客观的评述。当然，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在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片声讨声中，也有少数学者能对八股文采取一种比较平和的研究态度，比如周作人、钱基博、刘鉴泉、卢前、钱穆、商衍鎏、钱仲联等，已初步肯定八股文在明清文学史乃至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入8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大多数人对八股文的认识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则有部分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八股文，出版有王凯符《八股文概说》、启功等《说八股》、邓云乡《清代八股文》、张中行《闲话八股文》等著作，但这些著作基本停留在知识介绍和认识反思的阶段，真正把八股文研究推向深入的是一批在90年代以来涌现的中青年学者，如孔庆茂的《八股文流派论》、潘峰的《八股文论评试探》、黄强的《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扬波的《八股文专题研究》、高明扬的《科举八股文专题研究》、李光摩的《明代八股文形态研究》、龚笃清的《明代八股文史探》等，这些研究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八股文作为研究考察对象，其着眼点则放在明清文学及文化史上，他们是要透过八股文文体去考察明清时期的文化生态和文体样式。

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研究八股文，有一本书是不得不读的，这就是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它是一部系统论述八股文体制、源流、文风变迁及写作技巧的学术随笔。

一、梁章钜生平简介

梁章钜（1775—1849），字闾中，又字茝林，晚年自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其族系出安定梁氏，在宋时出了一位丞相梁克家，但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亦即从明迄清乾隆中，未曾有人掇巍科、登显宦，直至乾隆四十年（1775）梁章钜的叔父梁上国中进士，才结束了这一家族“十四世相继为诸生”的命运。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里，在他的父亲梁上治的指教下，梁章钜从12岁那年（乾隆五十一年）起开始习八股文、为将来踏入仕途作准备，14岁那年他进入福建著名的官学鳌峰书院，得到了孟超然、

郑苏年、林茂春等名师的指授，名师的点拨，加上先天的聪慧和个人后天的努力，章钜先后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举人，嘉庆十年（1805）中进士，随后过了长达12年的家居、讲学、游幕的生活，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才入京就职仪制司。嘉庆二十年（1815），梁章钜考取军机章京，三年后正式入值军机处，然后便是长达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先是扈蹕出巡各地，而后出任荆州知府，转淮河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授山东按察使，调江苏布政使，任甘肃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实授广西巡抚，又转调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二年（1842）引疾辞官。而后是隐退乡居著述的7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于家，年75。梁章钜为官二十余年，为政颇能持大体，不以科条扰民。据《退庵自订年谱》：道光十年辛卯（1830），江淮大水成灾，流民蔽江而来，每日以万记。其率僚属捐廉，出示募捐，一面给船咨送，一面设厂留。“自初秋至冬孟三月余日，资送出境者六十余万人。自初冬至次年春季在厂留养者四万余人。复自捐棉衣万裘，以为厂中御寒之具，于三月末陆续资送北返，沿途颇有颂声”^①。不仅如此，他一生勤于著述，无论家居，还是为官，稍有余暇，便手不释卷，并乐此不疲。“提槧铅于簿书之际暇，劬笔削于戎马之间。”^②据林则徐所撰墓志铭载，知其著作大致有68种之多，实存者约有五十余种。于经有《论语旁证》二十卷、《孟子旁证》十四卷、《夏小正通释》四卷；于小学有《仓颉篇校证》三卷；于史有《三国志旁证》二十四卷；于掌故有《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枢垣纪略》十六卷、《春槽题名录》六卷、《南省公余录》八卷；于考据有《称谓拾遗》十卷；于文章有《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其余诗文杂著纂辑者不下数十种。《制义丛话》是其65岁时（道光十九年）所辑。

二、《制义丛话》之编纂及体例

大凡古时作者之著述皆有为而作也，或为“抒怀”，或为“立言”，诚如刘彦和所云：“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文心雕龙·序志篇》）也就是说，任何一部著作的编纂都是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的，梁章钜编纂《制义丛话》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他自己没有明说，但通过其朋友杨文荪、江国霖及后学吴钟骏的序文及其自撰例言可以推之大概。

其一，是对明代以制义取士以来的八股文“制作”进行系统的总结。自明太祖朱元璋确定以制义取士，洪武十七年（1384）颁布《科举程式》，二十四年（1391）定下文字格式，《明史·选举志》云：“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

① 王军伟：《传统与近代之间：梁章钜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附《退庵自订年谱补释》，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01页。

② 吴钟骏：《制义丛话后序》，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89页。（以后同本书只注作者、书名及页码）

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这样做的目的本意在崇本息末，先之经义以询其道，次之论判以观其学，再次之策时务以察其才之可用，而唐宋时期运用较多的诗赋取士以其“文辞之夸乎靡丽，章句训诂之狙于空谈”则悉屏除之。^① 尽管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八股文并非是其全部内容，此外还要考诗赋、策论等，但它却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例如，童生考试，县试要考四五试，前后要写三五篇以上的八股文，其中头场最重要，要写二篇；乡试（省试）、会试的内容较多，但最重要的仍是八股文，通常要写三篇，所以人们称明清科举取士为‘八股取士’”^②。八股取士的制度在明清两朝推行了五百年之久，明清两朝各级学校也把八股文教育作为其教学的中心内容，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成千上万的读书人特别是青少年从读八股到写八股，有的人甚至将其一生的精力耗费在八股文的写作上，所谓“为诸生者无不沉溺于四书注及先辈制义，白首而不暇他务”^③。可见，八股文对明清两代读书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何其深刻！正如江国霖所说：“制义虽代圣贤立言，实各言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有明以来以制义取士，迄今盖五百年。萃五百年之英才，悉其聪明才力，研精殚思于八比之中，各出其学以相胜，而又列科选隽，分省程材，此亦如天之风云、地之花木、山之烟岚、海之潮汐，固有彼此殊状，月异而岁不同者，非有人会而萃之，溯源流、别支干、搜轶事、辑异闻，安能使五百年之才人精神辞气、谈笑诙谐毕露于后人耳目之前哉。”^④ 在他看来，《制义丛话》的编纂，“抉其菁华，综其同异”，就是要使五百年之才人精神辞气、谈笑诙谐毕露于后人耳目之前，让后代人了解明清两代读书人的喜怒哀乐。

其二，是为了纠正明清两代在八股文利弊问题上倚轻倚重的看法。自从明初推行八股文取士制度以来，关于这一取士制度的合理性，朝廷上下不时泛起责难之声，八股文也经常遭遇被指责和被谩骂的尴尬处境。“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做不了官也是八股文害的。”^⑤ 一般来说，在明代，对八股文的指责或攻击，主要是从文体的角度或完善考试制度的角度着眼的。比如成化年间的进士吴宽说：“今之世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说，谓之主意。其说穿凿牵缀，若隐语然，使人殆不可测识。苟不出此，则群笑以为不工。盖学者之所习如此，宜为人所弃也。而司文者其目之所属，意之所注，亦惟曰主意而已。故得意者，虽甚可厌之言一不问；其意失，虽工辄弃不省。……呜呼，文之敝既极，极必变，变亦必自上之人始。”^⑥ 这里，他既指出了

① 茅大芳：《乡试小录序》，《希董堂皇集》卷上，道光十五年刻本。

② 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③ 彭蕴章：《又书何大复集后》，《归朴龛丛稿》卷十，同治刊本。

④ 江国霖：《制义丛话序》，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第5页。

⑤ 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⑥ 吴宽：《送周仲瞻应举诗序》，《匏翁家藏稿》卷三十九。

八股文内容、形式之局限，也特别反对其割裂四书章句以命题的考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代学者对八股文又爱又恨的态度，爱之者以其能为应试者带来功名富贵，恨之者则因其严重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耗尽了许多青衿学子的青春和心力。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对八股文置以赞辞，如著名的思想家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闻见不应，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诗何必古选，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①他在《时文后序》中还说道：“时文者，今时取士之文也，非古也。……彼谓时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远。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矣。夫文不可以行远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国家名臣辈出，道德功业，文章节气，于今灿然，非时文之选欤？”^②认为时文和近体、传奇、杂剧等一样，是此一时代最好的文体，是“至文”。在晚明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袁宏道和王思任，袁宏道说：“今代以文取士，谓之举业，士虽借以取世资，弗贵也，厌其时也。夫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顾奚必古文言而后不朽哉？”^③王思任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④在清代，关于八股文的论争已由利弊之争上升到存废之争的高度，而且在康熙二年（1663）也确曾一度被废止，尽管在康熙八年（1669）又重新恢复了以八股取士的制度，但关于八股文的存废之争在清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著名的就是乾隆三年（1738）舒赫德与鄂尔泰之间的论争，这说明八股取士的制度确实是有利亦有弊。梁章钜正是想在这一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制义不可废”，杨文荪为《制义丛话》所撰序文说：“我朝文治蔚兴，作者辈出，迄于今，风气亦屡变矣，而设科取士之法，五百年相沿未改。重之者曰制义代圣贤立言，因文见道，非诗赋浮华可比，故胜国忠义之士軼乎前代，即其明效大验。轻之者曰时文全属空言，毫无实用，甚至揣摩坊刻，束书不观，竟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故列史《艺文志》制义从未著录。是二说也，皆未尽然。夫制义之重也，有重之者；其轻也，有轻之者，非制义之有可轻、有可重也。自有制义以来，固未有不根柢经史、通达古今而能卓然成家者，若他书一切不观，惟以研求制义为专务，无惑乎亭林顾氏谓八股盛而六经微也。窃尝怪当世之士，童而习之，弋科名、跻臬仕，及询以制义之源流正变、盛衰升降，则茫然不知所云，又何论根柢经史、通达古今耶。然欲明乎源流正变、盛衰升降之故，非荟萃群言，勒为一书，无由溯其源而导其轨。”

其三，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出现的特有的新文体，却从来未有人在这一方面做过系

① 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页。

② 李贽：《时文后序》，《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7页。

③ 袁宏道：《诸大家时文序》，《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④ 王思任：《唐诗纪事序》，《王季重十种·杂序》，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版，第79页。

统的整理工作。杨文荪说：“昔挚仲洽《文章流别》久已散佚不传，传者刘彦和《文心雕龙》为最古，所言文章利病穷极微妙，千古论文之书莫精于此。宋以后，诗话日出，独遘文话，至论制义者，更绝无其书。”^① 梁章钜亦云：“文之有话，始于刘舍人之《文心雕龙》，诗之有话，始于钟记室之《诗品》，降而宋王铨之《四六话》，近人毛奇龄之《词话》、孙梅之《赋话》，层见迭出，惟制义独无话。非无话也，无好事者为之荟萃以成书也。”^② 在他们看来，八股文与传统文体——文、诗、词、赋、四六等一样，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最重要的文体，而且还在明清两代被延用五百年而不衰，但关于这一文体的理论总结性著作却从来未有人进行过，梁章钜正是想在这一方面做一点开拓性的工作。其实，他的这一工作也是在阮元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曩阮相国云台师，尝令粤东学海堂诸生辑《四书文话》，未成书”。但据《学海堂集》本阮元《四书文话序》所云，《四书文话》无卷数，周以清、侯康、胡调德合辑。分二十四门：一原始，二功令，三格式，四法律，五体裁，六命题，七程文，八稿本，九选本，十墨卷，十一社稿，十二元镗，十三名誉，十四考核，十五师承，十六风气，十七兴废，十八流弊，十九起衰，二十假借，二十一咎毁，二十二谈数，二十三轶事，二十四五经文。已成书，未刊，稿本见存广州学海堂中。在前代，同类著作有朱良钜《经义模范》、倪士毅《作义要诀》、王充耘《书义矜式》等，在清代，也有赵国麟《制义纲目》、鲁九皋《制义准绳》、李元春《初学四书文法述要》等，但这些著作大多是探索八股文的具体写作技法，而忽略了对八股文源流盛衰等理论问题的研讨，在这一方面比较多交待的是李调元的《制义科琐记》，这是一部关于明清科举考试的笔记类著述。作者自序谓：“自明以迄于今，几五百年，储才养士之厚，率旧作新之制，文人学士多喜谈而乐道之，其杂载于高文典策、稗官野史之内者，更仆未易悉数。予于诵读之余，随见摘抄，自明洪武开科以至于今，共得百十余，杂集成册，为制科雅话，以鸣盛事，亦以见国家待士之隆也，故曰《制义科琐记》，亦聊以备典故云尔。” 屈守元先生认为，关于八股取士的文献，世俗但知梁章钜《制义丛话》，其实梁书乃取资于《制义科琐记》也。^③ 也就是说，梁章钜是在前代诗话、文话、词话等著作的启迪下，在当代学者如阮元、李调元等人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制义丛话》。“今大中丞梁荃邻先生辑《制义丛话》二十四卷，凡程式之一定，流派之互异，明宗旨，纪遇合，别体裁，考典制，参稽史传，旁及轶事，与夫诸家之名篇隽句，无不备载。”^④ 《制义丛话》是对清代相关研究著作的集大成，是一部“明宗旨，纪遇合，别体裁，考典制”的八股理论研究的鸿篇巨制。

从《制义丛话》的体例看，主要是对前人论述的汇编，必要时也附以编者按语，

① 杨文荪：《制义丛话序》，《制义丛话》，第4页。

② 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制义丛话》，第7页。

③ 转引自詹杭伦：《李调元学谱》，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④ 杨文荪：《制义丛话序》，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第4页。